



# 跨境与交流 两岸“之台湾(大陆)”古典诗研究(1895-1937)\*

林豪<sup>1</sup>, 张羽<sup>2</sup>

(1.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1895至1937年间,一些传统文人或为亡命,或为应聘教学,或为视察,或为旅行,穿梭于两岸之间,留下了不少以“之台湾”和“之大陆”命名的诗歌作品。此类诗歌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大陆旅台文人在台期间的诗作,也包括一些内渡文人以“之台湾”为题首写的诗作。另一类是台湾传统文人创作的以“之大陆”为题首的诗作。这两类诗歌记载了日据下台湾人民殖民地生活的苦难,呈现了两岸历史文化交流的面貌,承载了知识分子深厚的民族情感。

**关键词:**“之台湾”诗;“之大陆”诗;历史文化交流;民族情感抒写

中图分类号:I222(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4)10-0078-06

本文题目中“之台湾”的原义是“往(到)台湾”,“之台湾”诗就是赠送某人到台湾的诗歌。日据时期很多诗歌的题目都有这三个字,也都是这个原义。如丘逢甲写的组诗《送颂臣之台湾》,八木善之助的《送久保天随先生之台湾》。与之相仿的有“之大陆”诗,如赖和的《送虚谷之大陆》,周定山的《将之大陆感赋并留别诸亲友》。台湾学界从50、60年代始对台湾古典文学的研究越来越活跃。然而对海峡两岸文人的“之台湾”和“之大陆”诗的研究,目前为止,台湾学界还少有专题文章深入探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尤以廖雪兰教授的博士论文《台湾诗史》<sup>[1]</sup>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文章中介绍了章太炎、梁启超、梁令娴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诗歌,但没有专门介绍以“之台湾”为题首的作品,都是大陆文人旅台期间的诗作。而对于“之大陆”诗歌的研究则无人提及。19世纪80、90年代,在台湾土地上,“甲午战争深刻的历史灾难,使台湾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下等‘国民’,他们的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sup>[2]</sup>但是两岸在此背景下的历史文化交流并没有割断,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血脉相通。本文之所以把“之台湾”或“之大陆”三字从题目中单独抽取出来并作单独的文类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方面,此类诗歌的大量存在,证实了即便是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也没有完全割裂两岸传统文人的跨地域文化交流和互动,呈现出浓厚的中华文化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此类诗歌具有旅行文学中的空间地理学的意涵,又深刻蕴涵了两岸传统文人共有的“乙未割台”后的历史和民族情感。本研

究将从两岸文人的传统诗歌入手,从学理层面总结日据时期两岸传统文学的互动与文化融合,对促进当前文学交流有其现实意义。

大陆旅台文人在台期间,或对自己的学术、政治生涯感叹,或对台湾的局势悲慨,或寄情于各地景致,或感时感物抒怀都写下了不少“之台湾”诗作。这些“之台湾”诗作呈现了大陆文人在日据时期与台湾的历史文化交流,且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了在台湾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所引发的民族情感。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于1898年12月7日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因言语激进,反清意识浓厚,见忌于朝廷,于1900年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介绍给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赴台避难。避难期间章太炎写了三首“之台湾”的诗歌,在空间地理学上意为在台湾期间写的诗歌,在学理层面上是大陆文人对台湾在日据时期的创伤引发民族情感的诗歌,同时也是两岸在日据时期交流的重要见证,是两岸民众共同的民族情感记忆。台湾被日本占据后成为亚细亚的孤儿,由此对两岸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不仅在台湾充盈更是对大陆文人产生重要的影响。章太炎的首三首“之台湾”诗歌便是大陆文人在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后,用诗歌表达出的受创伤的民族情感和两岸历史文化交流共同的历史记忆。太炎于1900年来台,翌年归国,寓台数月,时与台北人士过从,互相酬唱,以寄幽思。”<sup>[3]</sup>陈衍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W137)。

作者简介:林豪(1988—),女,福建永安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张羽(1972—),女,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



《石遗室诗集》里有七言绝句《岁暮怀人(吴彦复章太炎)》云:座上当年识孟嘉,寄书闻我出京华。北山憔悴太炎老,说士曾经众口哗。<sup>[4]</sup>连横 1924 年创刊并主编的《台湾诗荟》辑录“太炎诗录”十二首,寓台数月间,太炎诗作仅三首,但可见他的“心理构图”,即对过去台湾经验与印象的记忆集结。

《钱岁》<sup>[5]</sup>是章太炎在玉山吟社上吟咏的诗作之一。当时章太炎加入玉山吟社吟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日本 1895 年据台后,随后来台湾的日人中,具有汉学背景的甚多,包括官员或任职于报社的职员,他们组织了不少诗社。玉山吟社成立于 1896 年,是日人在台湾最早组织的诗社。主要由加藤雪窗、水野大略、土居香国、馆森袖海等二十余人成立,其后章太炎、台人李石樵、陈淑程、黄植亭等加入。时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的章太炎,因为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机关工作,在日官手下做事,一旦上司有吟诗之趣,便也侧身诗社以共欢。日本文人官僚以传统诗文吟唱来拉拢传统文人,造成了日据时期台湾传统文坛的复杂情状。《台湾日日新报》的主编初山衣洲是玉山吟社的成员。“章太炎到台湾不久,曾致书原《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告以在台情况,提到‘文士在此者,以法院水尾晚脆,报馆主笔初山逸、督府小吏馆森某位最’。初山逸、即初山衣洲,他和水尾晚脆都是玉山吟社社员,章氏也参加唱和。馆森某,即馆森鸿(子渐)。他们‘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或者因学术研究上有近似处,或者因这些日本友人中如馆森鸿表彰日本明治维新人物,‘叙述中兴诸贤’,有一定共同点,从而诗文酬酢,彼此相善。”<sup>[5]</sup>但是在和日人诗歌唱和的过程中,章太炎写的三首诗歌是带着自己浓厚的民族情感应和的。虽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需和日人交往,但在诗歌中章太炎抒发了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痛。

《钱岁》<sup>[6]</sup>一诗章氏写了自己当时避难台湾的状态和心理感受。诗中作者写到“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表达了诗人在台湾期间对中原一片荒凉的感叹。“今我行江汉”里的“江汉”是张之洞所居之地。章太炎在武汉的时候受张之洞器重,张之洞曾经招募章太炎去江汉。诗句中还用刘荆州美称张之洞,表明张之洞像刘荆州一样会识才。但是当时章氏并没有真正得到张之洞的重用,张之洞只是利用章太炎。这其中即暗含着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的相似处境。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机关工作,他不得不出表面上的相善行为,诗文酬酢当为相适一举。章太炎在诗

歌中间接抒发了民族情感,是对历史文化的文字记忆。诗句中的“迷阳”出自《庄子》,指荆棘、坎坷之路。意思即为当时去江汉重重的荆棘之路,暗指台湾受创伤的殖民之路。诗末作者转为对人生寿命短暂的感叹,也是对自己前半生因历史和现实所遭受的创伤的真实民族情感。“不作彭殇念,吾犹恋楸球,短长看日夜,身世等蜉蝣”,诗人言,虽然他不知道人生的寿命,但是他还恋台湾。这其中也透露了作者对生命短暂的无奈和对自己还未施展志向孤身在台湾的遗憾和悲痛。末句“残鬓睢阳恨,余生逝永浮,青阳东国作,春又满蛉洲”中“青阳”是春天的意思,“东国”与“蛉洲”都是指台湾。作者希望台湾是春天的开始,春天布满台湾之地,也暗示自己内心的台湾之春,亦是作者避难在台湾的真实历史情感写照。作者也希望自己此时在台湾是新的希望,希望中原的荒凉不会蔓延到台湾。

1940 年后延续汉学命脉的书房和诗社都在日本总督府的控制之下,前清遗留下来的教育机构被日本高压和怀柔的双向统治策略严格控制而导致无法生存。但是两岸的文人在此情境下并没有停止延续汉学的举动,台湾来大陆的文人和大陆去台湾的文人都在积极交流唱和,互相慰藉,以寄托民族情感。章太炎在诗末写到“吾犹恋楸球”、“身世等蜉蝣,余生逝永浮”也是由自身处境引发的对日本对台湾残酷的殖民统治的悲痛民族情感抒发。

章太炎的另一首寓台诗歌为《玉山吟社席上即事》<sup>[7]</sup>,诗人用王敦的典故“唾壶击破”引领全文。王敦最喜欢吟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也是作者的心声。王敦常常造反,用玉如意敲唾壶,作者用此意象表达了心中的愤激不平。这是另一种对心中所受创伤的民族情感的历史反抗。此时,台湾已属于日本的殖民地,正如破碎的壶,有了斑斑的残迹和不可收拾的局面。“弹指苍茫景物更”一句,指国事的变幻。风云变幻下,国势危急,魂断心惊。“满地江湖吾尚在”意指只剩诗人在台湾孤独。把台湾的现状和席上即事很好的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又形象,也可看出章太炎对历史和现状所受民族情感创伤的深切感怀。“棋枰声里俟河清”,正道出了诗人在下棋声里等待天下太平,呈现了悲凉声中的渺茫之态。等待历史改革的光明和希望,寄托自己对两岸国事不安的民族情感,是诗人借题讽喻的初衷。

在玉山吟社所作的第三首诗歌《寄梁启超》<sup>[8]</sup>章太炎用了《诗经》、《长杨赋》、《墨子》等先秦、汉代的文学作品里

章太炎《钱岁》(玉山吟社课席上分韵):狂走上城隅,城隅无棲翼,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昔我行东越,道至安溪穷,洒泪思共和,共和在海东,谁令诵诗礼,发蒙成奇功,今我行江汉,候骑盈山邱,借问杖节谁,云是刘荆州,绝甘属朝贤,木瓜为尔酬,至境盘盂书,文采耀田侯,去夕不复顾,迷阳当我路,不作彭殇念,吾犹恋楸球,短长看日夜,身世等蜉蝣,残鬓睢阳恨,余生逝永浮,青阳东国作,春又满蛉洲。

章太炎《玉山吟社席上即事》:唾壶击破转心惊,弹指苍茫景物更,满地江湖吾尚在,棋枰声里俟河清。

章太炎《寄梁启超》:秦风号长杨,白日忽西匿,南山不可居,啾啾鸣大笛,河图日已远,鸱枭日以怒,安得起槁骨,掺去共驰步,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北,鉴皇穹黎庶,均平无九服,顾我齐州产,宁能忘禹域,击磬一微秩,志屈逃海滨,商容冯马徒,志在除纣辛,怀在殷周世,大泽岂无人。



的意象来表达身处的历史困境和心中对民族有光明前景的坚持。“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北”正恰切的道出了作者自己的困境；在受历史的创伤下两岸都无处可逃的忧虑的民族情感。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章太炎表示支持，并把新撰诗文寄去发表。梁启超认为“应以译述政书为第一义”，章太炎以为“哲学家言高，语进步退化之义，也未始不急”。他又录《艾如张》诗以赠，题为《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可见他对康、梁无任依恋，不胜缱绻。“顾我齐州产，宁能忘禹域”，表达出了诗人对故土的思念和热爱，希望团结身边包括康、梁等志士为朝廷效命。虽然章氏此时无奈只能“志屈逃海滨”，台岛之地却也容不下诗人心中的抱负。至此，诗人的民族情感大发：“商容冯马徒，志在除纣辛，怀在殷周世，大泽岂无人”，诗人自喻“商容”（商容是《封神榜》中殷商的丞相，因不满纣王的暴政，辞官回乡，后姜王后遭纣王所害，商容因为两位王子的求情还不能得到纣王的宽恕，就自尽了），是明确的表达自己有坚定的革政信念，宁死不屈的革政意志。所以诗中“志在除纣辛”，是作者借商容的遭遇和抱负来寄托自己的壮志。“怀在殷周世，大泽岂无人”，是诗人给自己留下的前途和信心，也是一种坚定的对政变胜利、对民族抱存希望的信念。此诗是身处台湾的作者内心失望又不甘心的民族情感抒写。诗人大肆宣泄，无不台湾文人的警醒。章太炎在诗中对台湾所受殖民统治的多层民族情感有着深刻和真实的抒写：他们内心失落但是又不甘于现状，虽然对祖国抱有希望但是又怨恨自己的无能为力，这正表明了知识分子用文字交流的历史手段来传递难以名状的、复杂的民族情感。

1909年春天林献堂携长、次二子前往日本东京就学，在即将回台的途中，往访梁启超于神户住所，并邀请梁启超到台湾访问。次年（1911）辛亥春，梁启超得伊藤博文之介绍，偕同女儿令娴、好友汤觉顿应雾峰林家等台湾遗老之邀至台。在台期间，梁启超多次和林献堂为首的栎社诗人相互酬唱，进行了历史文化交流，表达出了自己的民族情感。1911年旅台的两个月间，任公诗词多达101首，其中诗89首，词12首，合集为《海桑吟》。其中有许多沉郁悲凉之作，记录了台湾日据时期所受的创伤历史和任公心中难以排解的民族情感，表达了任公对台湾处境的哀怜和无奈。任公到台湾，受到了上等的待遇。不仅在台北，在台中时中南部的文人也聚集宴请，进行以任公命题定韵的唱和。由此可以发现，两岸传统文人在日据时期的历史文化交流的广泛性，他们心中共同的民族情感的集结需要借助诗歌来进行抒发和互相慰藉。虽然日本侦探在唱和之地四伏，但是仍旧减少不了台湾文人的热情和对任公的敬仰。任公抵达台湾之夜，在台北的荟芳楼受台北遗老百余人招宴，宴上赋《三月三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敬赋长句奉谢》云：劫灰经眼尘尘改，华发侵颠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纪

残春。

此诗是梁启超在台湾被日本占据后赴台文化交流写的“之台湾”诗歌。全诗是对台湾现状的创伤历史叙事和沉痛的民族情感抒写。“任公宛如民族使节，來台抚慰饱受异国凌辱十七年之替罪羔羊，台胞恰似迷途逢亲千愁万古，一吐为快，林痴仙和诗云：披云赌青天，慰我饥渴肠。任公之一言一行，均足发溃振聋。”<sup>[6]</sup>此诗为避日人侦察，委婉含蓄。任公郁结之胸怀，借诗发泄。诗社诸遗老领袖在梁氏的带领下，亦以诗抒发心中被殖民之创伤的悲痛与对故国之思的民族情感。台岛各方人士也借此时机大肆酬唱，以此抒发心中所受创伤的抑郁和痛恨之情。最使台人大为流传的乃为任公在台中雾峰以“追怀刘壮肃公”为题的古风。全诗长达620字，对刘铭传的感念发之肺腑。还有仿白居易的“秦中吟”作的《垦田令》。任公把民间生活的疾苦，无田地的惨状真实地诉诸于诗。纪实式的叙事是一种对百姓受历史创伤的痛苦所发自心底的哀叹，更是对日本当局的强烈的民族情感控诉。来自民间的对真实历史记忆的纪实性记录是对创伤历史最有力的回应。

王明珂说“一个民族，常以共同性的仪式或建立永久性的实质性纪念来加强集体记忆，甚至是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sup>[7]</sup>任公用诗歌的历史性教育来传递台湾受创伤的民族历史情感。日据时期诗人们遭逢割台之变局，感怀时运之不济，发为吟诵，以对外来统治者表示抵抗。任公此诗既激发了台人的民族意识，也影响了以栎社为代表的台岛诗风。栎社自任公来台赋诗之后，诗风渐为直白，更为真实的反映民间生活，也更强烈的表达出了民族意识和对汉文化维系的用心，遂也更招日人的警惕甚至诗社的活动也受日本总督府控制。任公对创伤的历史真实的民族情感抒发对栎社影响深远。诗中“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已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文人自勉的常说词。可见任公之诗对台湾社会影响范围之广。任公在《东归感怀》中对清廷的无能，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对维新的破坏，使台湾落入日本残酷的殖民宗主国之手，表达出了极度失望。正如诗中所说“蹉跎负尽百年心”，任公一方面对清朝统治者表示无奈，另一方面亲眼目睹了日本殖民者对百姓的残暴，也表示出了极度愤怒的民族情感。《拆屋行》记载了日本惨无人道的罪行：麻衣病痿血满足，负携八雏路旁哭；穷腊惨乘天雨霜，身无完裙居无屋。百姓被强拆屋宇的惨状历历在目，凄苦的生活场景让人扼腕叹息。任公乃秉笔直书，记录了日本不可逃脱的历史罪行。诗歌是历史的真实见证，是维护民族集体记忆和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对历史文化交流诠释的重要文化类型。

## 二

哈伏瓦斯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仍然具有支配未来的权力”。<sup>[8]</sup>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告诉我们，历史记忆是一种社会和民族的行为，作为传统的文人，他们强调历史



记忆表达民族情感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诗歌记录真实的历史。他们组织各类诗社,互相吟咏唱和,以发泄对祖国的思念和表达愤慨的被殖民的民族情感。赖绍尧和傅锡祺便是日据时期台湾传统文人的代表,他们用诗歌记录了台湾文人对祖国大陆的民族情感记忆。

赖绍尧,字悔之,彰化人。日本据台时曾功名断绝,内心无比的悲哀,他压抑心中隐藏着的巨大民族矛盾与日本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想要维持仕绅的地位,曾任大村庄(今彰化县大村乡)区长。但最后始终无法解决自己内心的苦难,死因据系自杀。赖绍尧的诗歌便由此人生的中心失落点扩散和凝聚。社会生物学家道肯斯曾说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为群体牺牲的社会性。赖绍尧为了失落的民族情感,在经历巨大的创伤后,通过道家之道找到精神的最终皈依。傅锡祺有七言律诗《哭悔之社长》赠之:骚坛盟主饮中仙,诗酒清狂二十年;谁料素娥偷药夜,恰当长吉断魂天!珠玑错落题襟集,风雨苍凉宝剑篇,弹指香山余五老,披图眉宇重凄然!<sup>[9]</sup>由诗可见二人感情深厚,悔之之死乃让同仁惊恻。悔之以诗名世,有《悔之诗草》,录于《台湾诗荟》中16首。其中与林痴仙、林幼春等栢社诗人唱和的占大多数。如《闻林十痴仙归自沪上喜寄》、《次韵幼春打墩见寄之作》、《即席与痴仙幼春咏怀》、《得幼春书却寄》、《送雅堂游京滨》、《台中访傅鹤亭陈枕山二君》等。可见悔之与栢社诗人相交甚笃,共同醉心于诗,借诗以寄托牢骚抑郁。<sup>①</sup>“其诗作多写处身日本统治下个人进退的冲突矛盾,兼具豪放旷达与柔媚婉约风格。”<sup>[10]</sup>其与栢社诸诗友唱和之诗多感慨悲愤与无助之辞,也表露出了对大陆根源之地的幻想和向往。

《送献堂旭东如禎三君之中国》<sup>②</sup>便是赖氏对林献堂等三诗友将赴大陆的感怀作品。作者借用庄子中“鲲鹏”的自由来反衬自己所受的创伤和不幸。“飘然、御风游、渺千里、隘十洲”都是诗人渴望和林献堂诸位一样自由地赴大陆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对生命归根之地的向往,对人性本真的蕴涵探求,对心性文化溯源,都表达了诗人渴望回到祖国并希望像庄子一样有自适超然的人生境界。赖氏对庄子艺术的阐释正适应了日据时代台湾文人所受内在的心理创伤而体现的民族情感的心理需求,其对自然之思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性情、风骨、文气的见解上。“年来我亦伤幽废,欲附沧溟泛钓舟”正是对庄子精神的深沉写照。诗中的想象都是根据庄子中的意象延伸出来的。他所学的四书五经在日据时期无法得到更好的利用,在科举上也无法如意,造成了他在精神上的极度失落。诗中

说“年来我亦伤幽废”正是此种心境的表达。然而作者深谙庄子之道,“欲附沧溟泛钓舟”,来转移他对科举对功名的渴望。这并非受创伤后的自我藐视和自我放逐,而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这境界也是由根源之地,即对大陆的向往所生的。作者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大陆上。“在庄子看来,万物都处于‘无我’(即无自性、无自我规定性)的状态。只有进入‘道’的境界,万物有了自己的归宿,‘物化’过程才会完成。”<sup>[11]</sup>赖氏对庄子之道的阐释即体现了“物化”就是对自然的真正归属。化之物与物本身的特性即自然的双重属性。二者之间的转化就是庄子之道的真正内涵,自然就是其中的支柱。而文化乡愁和民族情感的表达和皈依也需要自然所提供的根源之地。这也正是中国的文化生命和生存景观。大陆是日据时代台湾文人向往的逍遥之地,更是心灵的皈依之地。“1895后台湾完全与中国分离,受日本文化影响更大”等相关论调便无立足之地。以赖绍尧为首的诗人心中的归属便是故国的乡土和文化。在他们的诗歌中皈依道家亦可证明。此首《送献堂旭东如禎三君之中国》诗中,诗人借林献堂等人赴大陆之际,借用庄子的道家思想表达自己内心对自由对祖国的强烈渴望,是对故国思念的真切而深沉的民族情感抒写。诗歌里除了借用《逍遥游》的鲲鹏之外,作者还用了鸾凤(天空)、海洋(泛舟)宽广的意象,更进一步说明了诗人希望有用之地,希望祖国能有宽大的胸怀让自己施展。赖氏等创立的诗社命名为“栢社”,此名乃透露了日治时视己为无用之文人内心无限的凄凉,和台湾人民对自己身份认同感的极度失落的民族情感。赖氏诗作,除了和栢社诗友唱和外,还有一些写景诗,如《秋怀二首》、《秋尽》、《冬日登八卦山》、《岁暮杂感四首》等。其诗句凝练,感情真挚。诗人向自然倾诉自己的心思,谦和的思绪中透着淡淡的哀伤和对台湾处境无奈的民族情感。最后“且向斜阳听好风”一句道出了作者对自然和自由久违的向往,亦即对回归祖国的期盼。

1922年“栢社第一集”刊行时,社长傅锡祺之序文称“沧海栽桑之后,我辈率为世所共弃之人,弃学非弃人不治,故我辈以弃人治弃学。”<sup>[12]</sup>一种无奈但又不甘的心情跃然于上。淬炼诗文是栢社的目的之一,但是以栢社为载体互相抚慰故国之思却也为殖民地文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特别是读书氛围。赖氏在诗中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和向往,视大陆为万里河山任逍遥的地方。他也把政治和文化的多重乡愁寄托在了庄子的自然之道上。在他对自然之思中,庄子“至游”、“神游”的逍遥心态对他精神状态的影

宋泽莱,台湾文学三百年[M].台北:印刻出版社,2011.193.据连横收集其遗作共得66首。后来连氏将《悔之诗抄》与林痴仙《无闷词抄》合称《赖林二子诗词》,编入《雅堂丛刊诗稿》中,但并未出版。1987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将其影印出版,目前经龙文出版社重新整理影印,收入《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三辑第九册中(与《肖严草堂诗抄》、《厚苍遗草》、《南村诗稿》合为精装一册)。

赖绍尧《送献堂旭东如禎三君之中国》:低首樊笼路一邱,飘然忽作御风游。鲲鹏变化渺千里,鸾凤翱翔隘十洲。大海珊瑚凭网取,小山丛桂漫淹留。年来我亦伤幽废,欲附沧溟泛钓舟。



响使他深居诗文中而不愿于黑白不清的政治中沉沦。“大海珊瑚凭网取,小山丛桂漫淹留”的乡土情怀让诗人到达“游”的精神解放、“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使他返回“虚、静、明”的无己本真之途。然而这是对时代的无可奈何和对不可到达的路途的另一种民族情感的诠释和期待。这其中是悲剧色彩笼罩下的阴霾所产生的对人生的另类逃避。诗中也透露出了诗人极端忧郁的民族情感,“凭网取,漫淹留”本身就是无法达到的状态,作者在幻想,冥冥之中在暗示着作者真正的归属。虽然以“之大陆”作为幌子,但是真正的是要返回人生的终极之地即道家所宣扬的自然。这也不难看出诗人自杀的原因了。正如道家的至道,适己之适和适人自适的全其心性让世俗化的倾向放之形外,也展现了一种对真正生活状态的向往和皈依及对真正人格的好尚。赖绍尧对创伤时代、对创伤人生深切的体验,强烈地言说着中国文化中道家的至道。这是对人生悲苦的深层体验后而到达的放逸之至极也是最高的人格之美善。日据时期,台湾传统文人面对创伤的民族情感时用中国文化来排解心中的苦闷和无助。两岸交流的人事对作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慰藉回归故土的思愁还是安抚对祖国之思的期盼,作者借助了道家文化透彻的表达了出来。对道家至道的体认就是日据时期文人悲苦的民族情感的最好归宿。赖绍尧《送献堂旭东如祯三君之中国》中通过娓娓诉说的道家文化寄托了民族情感,也是对祖国文化深谙的最好见证,是日据时期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记录。

台湾之有栎社,自林痴仙始。栎社成立于1902年,为台湾改隶后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诗社之一。傅锡祺1906年加入栎社。傅锡祺加入栎社后长期负责该社活动联系、社员资料整理与记录、基金保管与运用等重任,是该社灵魂人物。<sup>①</sup>1940年代,日本统治末期,栎社第一代成员已凋零殆尽,傅锡祺与林献堂两人试图重振栎社声威,召募原社员的子弟门生加盟。傅氏并定期到雾峰为年轻学子讲

解史记、教导汉诗写作,目的在希望延续汉族文化传统,可见他对祖国深厚的民族情感。他的一生见证了栎社的兴衰,也是台岛文人复杂的民族情感的诠释。

《送少侯同社之大陆》<sup>②</sup>收录在傅锡祺的《鹤亭诗集》里,写于1927年。是年新筑茅舍于潭子帝国制糖工场东边。少侯乃锡祺之社弟。此首“之大陆”诗歌,是傅氏对社友的寄托,也是内心对赴祖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下的民族情感抒写。和“之大陆”诗相仿,当时傅氏也有“之日本”诗。<sup>③</sup>一方面是友人间的不免唱和,一方面傅氏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壮志未酬和孤身无依的感慨,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大陆的幻想和期待的民族感情。不管是“之大陆”诗还是“之东都”诗,作者频频使用祖国大陆的风土人情作为意象,如“吴越、黄河、吴风、秦火、蓬莱、归乡”等,透露了作者对祖国的向往。诗中萦绕着台湾被日本统治的悲剧氛围。虽有“送行、劝学”的意味,但最终都希望他们为祖国效力。作者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使诗歌充满着无奈之情,“定知归梦绕吟笺”,是作者对自己唯一的希望,希望自己能用诗歌为祖国保存文化。归梦无期,吟笺可续。“定知”一词加深了全诗的悲痛的民族情感色彩。诗人更加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且一定会付诸实践。这是诗人给自己的承诺,也是给同社诗友的见证。不管是“之大陆”诗还是“之东都”诗,傅氏都是用了自己对祖国的真情,这也是诗人对历史的民族情感记忆。诗中用词真切,平易近人。“富士山、樱花”等东都的物象是诗人借用以之暗示了当时被殖民的现状和无奈之情。“早将新智识,归飨旧亲朋”、“故里欲输新学入,客囊还检旧书温”便是最好的说明。汲取东都的新知识也不忘祖国的文化,用新知识最终亦是为祖国做贡献。“南游吴越北幽燕,鹤首先东向日边。富士山高安似昨,黄河水浊甚于前”诗句中,“向日边”一语是双关,虽然当时台湾是在日本的统治下,但是总会有光明的一天,总会有朝向太阳回归祖国的一天,作者用尽心思表达对祖国期望的民族情感。可见作者心中有无限的愁思

傅锡祺,栎社沿革志略[M].附注:自傅锡祺1906年加入栎社之后,便负责该社基金之实际收支、保管,并将基金存在银行,以赚取利息,提供诗社活动之用。1917年接任社长之后,仍然持续负责此一重任,保管该社基金前后长达40年之久,推测应该他的个性谨慎持重,获得全体社员的信赖所致。1946年傅锡祺去世后,栎社基金储存在彰化银行的存折,大约在1950年代由傅锡祺长子傅春魁转给叶荣钟保管(根据叶荣钟家属保存的信函可知)。目前叶荣钟家属已将相关书信及栎社基金存折捐赠给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笔者2006年曾在该馆查阅过。另外,傅锡祺家属目前仍保存由傅锡祺以工整毛笔书写的《栎社金钱出纳账》一册,记录时间从1906年到1946年,长达41年。至于栎社社员进退、死亡数据的记录保存,以及诗社活动的联系通知,也都是由他负责,从其家族保存的栎社史料可以确定。

傅锡祺《送少侯同社之大陆》:南游吴越北幽燕,鹤首先东向日边。富士山高安似昨,黄河水浊甚于前。有心所至饶桀触,具眼微闻着贺迁。热闹铃声忘不得,定知归梦绕吟笺。

如《送仲衡游东京》(其一):环球智识日求新,耻作辕驹老此身!君去乘风酬壮志,我来折柳赠行人。孤帆匹马天涯远,黄卷青灯客里亲。上野樱花开未了,入都犹及见残春。(其二)诗:盛传文物萃皇居,为借他山别故居;人效吴风新断发,地多秦火未焚书。殊方父子欢相聚,绝岛亲朋惜暂疏。缥缈蓬莱何日返?三千弱水放船初。(其三)诗:容易轻装便出门,壮心肯为利名昏?一船琴剑航神户,三月莺花别大墩。故里欲输新学入,客囊还检旧书温。同舟难逐林宗去,卖赋惭余滞兔园!还有《送少龄游学东都》诗:壮岁起担簦,长风浪几层!径抛三寸管,奋作九霄鹏。绝岛寻徐福,仙舟伴李膺(谓林君阶堂)。早将新智识,归飨旧亲朋。



和无限的悲痛即受着无限的创伤,仅能化作诗句以示忠心。诗中还表明了无奈向东都去学新知识的想法,所以诗人时时在诗中将对后辈叮咛不忘乡朋,不忘旧温。这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开明和先进的一面,傅氏并不固地自封,虽然时局是创伤的悲剧,但是要向东都吸取新学改变悲剧的境况。虽然自身无力,但是也要用自己能做的“吟笺”一举为祖国效力。诗中的创伤色彩是对自身无能的悲痛感触,更是对祖国江山沦落到此境深沉痛恨的民族情感。

### 三

诗歌与历史的对话在两岸传统文人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深化,两岸的传统文人不断交流、不断扩大历史的影响力。民族情感的历史记载不仅是“一位生活的老师,它还是一面特殊的镜子,是苦苦寻觅以辨清个人和集体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老牌的殖民者由此丧失了他们的帝国,古老的民族也从殖民的噩梦中醒来。”大陆文人章太炎的赴台诗和梁启超旅台的《海桑吟》,它们都记载了台湾在日据时期所受创伤的民族情感。都真实且深刻的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所受的苦难和被殖民的惨状,也是两岸传统文人在日据时期深入交流的历史见证,同时也表达了大陆传统文人在日据时期对台湾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对自己力量弱小的无奈之情。赖绍尧和傅锡祺具有代表性的“之大陆”诗歌亦共同体现了台湾日据时代与大陆在诗歌上进行的历史文化交流,寄寓了悲痛的民族情

感。他们想往祖国的山川,却无法赴之共赏。他们对祖国有满腔的期待却只能卑微地等待光明。“之大陆”诗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也记录了历史的残酷。

### 参考文献:

- [1]廖雪兰(一谨).台湾诗史[M].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
-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
- [3]廖雪兰(一谨).台湾诗史[M].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309.
- [4]陈衍.石遗室诗集[C].转引自廖雪兰(一谨).台湾诗史[M].1937.
- [5]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J].社会科学战线,1982,(4):144.
- [6]廖雪兰(一谨).台湾诗史[M].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313.
- [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1.
- [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0.
- [9]傅锡祺.标社:第一集[C].1924.2.转引自台湾汉诗数位典藏库[EB/OL].[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poetry/04/04\\_01/04\\_01\\_01.htm](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poetry/04/04_01/04_01_01.htm).
- [11]宋泽莱.台湾文学三百年[M].台北:印刻出版社,2011.193.
- [12]张成权.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47.

责任编辑 段君峰